

读后记

郝懿行的乡土眷恋
——读《晒书堂文集》札记

孙明浩

在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版图中，郝懿行以《尔雅义疏》《山海经笺疏》的考据成就立身，却始终以故乡栖霞为精神根系。他的文字里，没有文人墨客对故乡的泛泛咏叹，而是将一生深情熔铸于三重实践：以谱牒续修、文集整理维系家族根脉；以山水亲历、学术考据叩问自然肌理；以灾异记录、民风褒扬关怀乡民冷暖。最终，他以“归葬桑梓”的遗愿，完成了精神与故土的永恒融合。

谱牒与文集

郝懿行对故乡的眷恋，首先凝结于对家族历史的深耕细作之中。乾隆五十年（1785年），他与父亲郝培元携手续修《郝氏世谱》，在《郝氏世系考》中耗时数年博综源流，像一位严谨的考古者，在故纸堆中梳理郝氏自太原徙居栖霞的脉络。

他的严谨里藏着对故乡的珍视。在谱牒中，他特意标注栖霞六世先祖郝洁“授文林郎”、八世郝晋“任保定巡抚”的功名事迹，并非单纯炫耀家族荣光，而是将明代先贤的足迹嵌入栖霞的历史肌理——郝晋的宦海生涯、郝洁的文治功绩，不再是孤立的家族轶事，而是栖霞作为胶东文化重镇的鲜活注脚。直至晚年，他仍在书信中叮嘱后辈“守晒书堂旧业”，这座以晋代郝隆“晒腹中书”典故命名的“晒书堂”，自此成为郝氏家族的精神图腾。

若说《郝氏世谱》是对家族“血缘根脉”的梳理，那么整理八世祖郝晋的《丸啸斋集》，则是对家族“文脉根脉”的抢救。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郝懿行受父命从“晒书堂”旧藏中搜求残稿，面对先世遗稿“藏弃颇多，散佚不少”的困境，他像修复一件破碎的瓷器，比对笔迹、查阅《栖霞县志》《登州府志》，对虫蛀缺字参考文风，谨慎补全。

郝培元以老者的阅历为他提供线索，郝懿行则以学者的严谨赋予文献学术厚度，父子二人在“晒书堂”的灯下校勘文字的身影，成为栖霞“耕读传家”门风的最佳写照。书成后，郝懿行为《丸啸斋集》作序，既追念先祖的文学与政绩，更以“使先世声音笑貌，不随尘烟而逝”的初心，让家族文脉在栖霞的土地上得以延续。这种以亲情为纽带、以文献为载体的传承，恰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生动缩影。

山水与考据

郝懿行对故乡栖霞的眷恋，从未

局限于家族的小天地，而是延伸至对故乡山水草木的深度叩问。他的足迹遍布邑之四境，从东北五十里的洪花洞到西南三十里的方山，从城东四十里的柳乔庵到村头王氏庭前的小酌泉，形成一套“山水亲历—学术考据—情感守护—反哺学术”的完整逻辑。

为寻洪花洞，他“下骑步行，崎岖而上”，半里山路后在神祠小憩，再探“削石为门”的岩洞，细辨石上“圆牖如瓮口”的天光，连地上的“把火灰烬”都要揣度是游者遗痕还是乞儿烘燎。嘉庆壬戌年五月，因事经方山，他过小石桥、攀石磴，只为一睹圣水庵前“石龙口中飞出小瀑布”，再寻西北岩上“俯临绝涧，岌岌欲坠”的高孩之先生碑记。

这份“亲涉其地”的执着，在柳乔庵的探访中更显动人：沿溪循麓南行四五里，“草树蒙茏，不辨崖谷，走蔓飞条，横碍游骑”，他却“披寻忘倦”，直到“数武之外见兰若翼然”。登顶松阜时，他看“山高月小，烟锁翠微”；曙色初照时，又随同游登西北岭，“俯瞰祠檐，如接平地，谷谿谿者，杂树如荠”。他慨叹，“非余亲至，几不知吾邑之有兹山之奇也”，他要做故乡山水的“发现者”。

作为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郝懿行的山水记文从不含糊其词，每遇地名、俗名、传说，必以考据精神辨明源流。在《洪花洞记》中，他开篇便纠“土俗讹为凤皇（皇通凰）洞”之误，引《礼运》“穷于山川”、《尔雅》“山有穴为岫”，将洪花洞与东南虎斑洞归为“山中所常有”的岫类，既解民间“投烟一处，气腾诸窍”的奇闻，也不盲从“有人入洞闻鸡犬声”的传说，只客观记录“后为何人篆石塞洞口”的现状。游方山时，他析“圣水庵”之“圣”是土人“欲神此泉”的假借，就连邑志记录“方山晚市”奇观，都引《史记·天官书》“广野气成宫阙”来注解。这些考据，不是掉书袋的迂腐，而是以学术工具对“亲历所见”进行的梳理，让乡野奇闻有了可靠的学术锚点。更难得的是，他的考据从未消解情感的温度。在柳乔庵，见“诸山松最饶而柯叶繁茂”，他叮嘱僧人“勿寻斧斤，谨防樵采”。

栖霞的山水草木，最终反哺了郝懿行的学术研究，成为其经学成就的“源头活水”。他在《尔雅义疏》自序中坦言“少爱山泽，流观鱼鸟，旁涉蓀条，靡不覃研钻极”，这份故乡生活的积淀，让他的注疏突破了书斋考据的局限：释“薜茘”时，他结合栖霞山间常见的香草形态校正郭璞注的疏漏；解“麋”“麇”之别，以胶东屋脊的兽类习性佐证《尔雅》经文，被王念孙赞为“切实际，接地

气”。即便入仕京城后，他仍在《与孙渊如观察书》中忆及“栖霞山中观书，晨露沾衣而不觉”的往事，将故乡的自然观察融入《山海经笺疏》的名物考证。他的朴学研究，始终带着故乡泥土的芬芳。

灾异与民风

郝懿行的乡土眷恋，最动人的莫过于对乡民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他以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史笔，记录栖霞的灾异与民风，每一笔都倾注着“情寄乡民”的赤子之心。他的文字，从来不是写给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写给栖霞的每一位父老乡亲。

乾隆己酉年（1789年）的那场大水，成为他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在《记灾》中，他开篇便勾勒出触目惊心的画面：“六月八日，甚雨，遂大水，漂田亩、禾稼无算，濒河居民庐舍一空，地稍高者登丘避之，呼噪之声闻远近。”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白描式的记录，却让读者仿佛能听见灾民的呼救声穿透纸页。他不仅记栖霞一地，更扩至“登、莱、青三郡悉同”，甚至远及济宁、天津、河间，展现出“故乡之难即天下之难”的宽广视野。而对陈家村关帝庙“水将及，忽门辟，有灯出其中，水旋退”的民间传说，他未作评判，只是客观收录。这并非迷信，而是对灾中百姓精神寄托的理解与尊重。

灾异的残酷远未结束，冬春霜、雹接踵而至：“三月十二日霜灾，数百里之地禾麦皆死，树叶翻坠如秋；四月十三日雹灾……”他敏锐地捕捉到灾荒对民生的连锁打击，更在文末附录同乡数学家、考据家牟廷相的记述，还原灾后的复杂图景：麦禾被霜杀后，农民“采而刍之”，太守却“揭示严禁，以待麦秋”，半月后麦禾“生意怒发，或有四五岐者”，产量反超无霜之地。这段细节里，他看到了太守的远见、抚军长公的为民之心、天子的“遇灾而惧”，更看到了栖霞百姓在苦难中生生不息的韧性。郝懿行特意记下这段“国史将不书”的往事，怕后世遗忘这场灾荒中人性的光辉。

在郝懿行的笔下，更有淳朴民风的温暖。西门外的林翁复初，是他心中的“义士”典型：“翁居近负郭，迹寄城市间，心存田园乐”，佣人垦土得金，主动献予林翁，林翁却坚决推辞。郝懿行对此感慨万千：“堪叹古谊衰，嗟哉世情薄。偶争锥刀利，骨肉相销铄。林翁不知书，胸衿自挥霍。”他特意点明前邑令杨公曾匾其门曰“义高管华”，将林翁与

管宁、华歆“割席断义”的典故相连。

对吕有年、张自得拾金不昧之事，郝懿行更是“并记焉”：陕西商贩马贵遗失银四百两，乡曲小民张自得拾获后告知舅父吕有年，二人即刻赴官禀报，最终获朝廷赏银、官布及匾额。他说“二事正同，并可见俗美风淳”。在他看来，这些“重义轻利”的百姓，才是栖霞最珍贵的财富。即便是尝丐食于邑之南村的无名乞儿，他也以悲悯之心收录“托梦牟氏”的故事。

作为朴学大师，郝懿行的关怀更体现在以学术专长为乡民发声。在《岨嵎山记》中，他以考据为刃，剖开岨嵎山“以金得名”的历史迷雾：隋代牟州刺史辛公义于此得黄银献之，土俗讹传为“黄金九屋”，俗儒竟“纪之于石”，此后朝廷置“金户”充贡，让栖霞百姓“历唐、宋、金、元，民不胜苦”。他结合亲身见闻，“尝以秋冬过金山村，见沿河居地有聚于水者，询其事，曰‘淘金’”，再引《论衡》《华阳国志》证明栖霞之金“纤靡大如黍粟，不足充贡”，怒斥“甚矣，俗儒之为祸也！”这份愤怒，是学者的担当，更是对乡民疾苦的深切悲悯。

郝懿行的一生，足迹虽及济南、北京，心却始终系于栖霞。他卒于户部任上，遗愿唯有“归葬桑梓”。妻子王照圆遵其愿，将灵柩运回栖霞，葬于城北金钩山腰。这座墓以自然石块砌成，为土坑竖穴，葬事简陋却古风朴朴。郝懿行墓每年均有文人学者前往凭吊，1978年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升为烟台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乡以最朴素的方式，接纳了这位游子的魂魄。

王照圆以二十余年光阴闭门整理其遗书，是对郝懿行乡土情结的最好回应。郝懿行生前许多著作未能刊刻，她“闭门谢客，日夜校讎”，从散落的手稿中梳理出《晒书堂集》《尔雅义疏》等。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让郝懿行的学术成就传世，更让“晒书堂”成为栖霞学术文化的符号。

栖霞乡民的尊崇，让郝懿行的精神真正“魂归桑梓”。他记录的洪花洞天光、方山云气、柳乔庵松涛，他褒扬的林翁高义、乞儿尊严，他批判的“金户之累”，都已融入栖霞的文化记忆，成为故乡精神的一部分。他的“魂”，早已融入栖霞的每一寸土地——在“晒书堂”的残卷里，在洪花洞的天光中，在柳乔庵的松涛间，更在每一位栖霞人对文化根脉的坚守里，成为永恒的桑梓记忆。

参考文献：安作璋主编《郝懿行集》（齐鲁书社2010年4月版）

晒书堂文集

晒书堂文集卷八

论

棲霞郝懿行南泉著

晒书堂文集卷八

人知刑賞貴於忠厚而不知尤貴於嚴明一有不當下之不足示威權上之貽害於國家至於事幾決裂而追咎致禍之由於是謂忠厚不可用而刻嚴可以行三代所以有道之長而亡秦所以無道之暴也豈不悲哉華元與鄭戰莫不與而羊斟陷於敵晉侯賞從亡藏不及而子推焚其身二者之於刑賞奚啻乎管論之日宋人蓋失刑而晉君未為失賞也華元之相宋特一庸懦寡斷之夫彼士卒之不用命其固然也一旦殺羊羹士而對不與非新也其意或謂對吾御也親昵非他人比一羹之與不與無不可而不虞遂至與尸也至若晉文英斷之才非華可比始即位而行賞將以勵羣臣風示諸侯也其輕重後先必非漫然者觀其語賈臣盡叔曰導我以仁義者受上賞轉我以行者受次賞以力事我者復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于是故以子推之忠且勸